



潘文国 著

字本位与 汉语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ZIBENWEI
YU HANYU
YANJIU

序	徐通锵	1
绪论篇 汉语研究期待变革		1
第一章 汉语研究的世纪回眸		3
本论篇 字本位与汉语研究		49
第二章 “本位”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51
第三章 “字本位”的认识论与本体论意义		72
第四章 “字”与 Word 的对应性		95
第五章 字本位的语音研究——音韵学		120
第六章 字本位的语形研究——形位学		142
第七章 字本位的语形研究——章句学(上)		174
第八章 字本位的语形研究——章句学(下)		200
第九章 字本位的语义研究——字义学		221
第十章 字本位的语用研究——音义互动		243
引用文献		269
人名索引		285
主题索引(及术语英译)		291
代后记 字本位理论及其在教学中的应用 ——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讲演		305

序

徐通锵

文国同志将他的新著《字本位与汉语研究》的打印稿寄送给我，要我写一篇序。我是字本位理论的倡导者，看到一本志同道合的学者所写的论著，自然很高兴，写一篇序，谈一点读后感，好像也是一件义不容辞的事情。

字本位理论是汉语研究和语言理论研究的一条全新的思路，现在已有不少学者从不同的侧面研究和运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字本位与汉语研究》是这种研究的一项最新成果。这本著作很有特色，从理论上阐述字本位和汉语研究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深思、涉及汉语研究方向和途径的问题。这是对现在流行理论的一种挑战，不管人们同意或不同意，都值得一读。我作为第一个读者，读后印象颇为深刻，下面几点，我想值得说一说：

第一，以字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并用对比的方法论述汉语的字对应于印欧语的词。这种对比性的研究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可以帮助人们排除语言中特殊的表面现象的干扰，透视隐含于结构单位背后的规律和原理。论著把隐含于词和字中的共同结构原理（共性）归纳为四条（天然单位、民族认识世界的基本单位、语言各个平面的交汇点、语法上处于承上启下的枢纽位置），与徐通锵的现成性、离散性和语言社团的心理现实性的三条，提法虽异，但基本精神一致，而且还增加了一条基本结构单位与语言系统的关系，内容显得更充实。我们过去所以会把词看成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就是由于没有透过特殊的表象去悟察一般的结构原理，把“词”这一汉语中“本来没有这样一种现成的东西”（吕叔湘：《语文常谈》45页，三联书店，1980）当成汉语的结构本位，致使汉语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的解决。

第二,根据哲学和语言学的最新发展趋势,重新定义“语言”,认为“语言”不仅是音义的结合,而且也应该包括形义的结合,“是人类认知世界及进行表述的方式和过程”,从而将文字也纳入语言研究的范畴。这一定义偏重于语言的认知和表达功能,与以往着眼于交际工具的作用不大一样。这里,把文字也纳入语言研究的范畴,这似乎太违背“常识”,学界的反对意见可能会大于反对字本位的主张。这里我想奉劝读者,少安毋躁,先了解一下作者的立论过程,仔细琢磨一个有成就的学者为什么会提出如此违背“常识”的意见的原因。文国同志的治学态度是严肃的,为了弄清楚“语言”的含义,查阅了19世纪以来几乎所有有关“语言”的定义,对收集到的60多个定义逐一推敲,认真比较研究,最后提出他自己的违背“常识”的定义,重新审视语言的含义以及文字在语言研究中的地位。这一违背“常识”的见解,至少对于汉语和汉字的关系来说,决不能视之为无稽之谈。索绪尔早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就清楚地申明,“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他们有时就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高译本51页,商务印书馆,1985)。结构语言学盛行之后,口语在语言学中的地位趋于绝对化;我们接受了结构语言学的理论之后也就遵循着这种绝对化的途径前进,把汉字完全排除出语言研究的范畴,并成为人们先入为主的“常识”。文国同志根据他对“语言”概念的认识,放弃了这种“常识”,把汉字看成为汉语社团的“第二语言”。他为此列举的很多理由,都不无道理;我也想在這裡湊一点热闹,补充一点意见,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别字”。印欧系语言的文字体系只有错字,没有别字。汉字自形成形声体系以后就产生别字的概念,纠正错别字就成为语文教学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别字,这是一个“富有中国特点”的概念。字的形、音、义三位一体,这是学界的共识和常识,一般的著作都是这样众口一词,但遗憾的是对这种共识和常识缺乏认真的推敲。其实,这种三位一体的实质就是用形义结合的理由衬托和凸显“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释名·序》)的音义结合的理由;别字抽掉了这种理由,使形、音、

义三位分离,破坏了汉字作为“第二语言”的身份,因而为汉语社团所拒绝。人们现在对别字现象已见怪不怪,因而也就不去推敲其中所隐含着汉语与印欧语的深层编码机制的差异,殊为遗憾。我这里无法对此展开讨论,但“别字”作为汉人视汉字为“第二语言”的一种见证,我想是不容置疑的。我们不允许或纠正学生写别字,实际上就是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第二语言”的训练,要求他们“文”与“言”一致。文国同志确定了汉字的“第二语言”的地位,而且还从符号学的角度对汉字的性质作出像似性(iconic)定位,并就此展开字义体系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很有特点的论断。这不仅和汉语的传统研究接上了轨,而且还为与国际接轨开辟了新的途径。文国同志先毕业于复旦大学英语系,受过西方语言学的训练;后又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做汉语史的研究生,毕业后从事语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学界同时受过这两方面科班训练的同志不多。他对中、西语言学都有详尽的了解,如果不是对印欧语的理论在汉语研究中的弊端有切肤之痛,不是对汉语与汉字的关系的性质有深切的认识,是不会支持、倡导字本位理论,批评汉语研究中的“印欧语的眼光”的。人们应该从他的一系列“违背常识”的论述中去悟察他的理论的真谛。

第三,充分重视音节和节奏在汉语结构中的重要地位,进行音义互动的汉语结构的研究。这是现在还没有人进行过系统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文国同志的这本著作在这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作者首先根据前辈学者的相关论述,认为赵元任的“音节和节奏在文言中起重要作用,而现代汉语的复合词的构成多数遵循文言的结构类型,因此音节和节奏也就成为复合词的构词要素”的论断是“汉语语言学对世界语言学理论的贡献”,因为“中外语言学史上,明确把音节和节奏说成是构词法、亦即语法中的‘要素’,这是第一次”。作者以此为基础,强调在由字的组合而构成的词中,音节和节奏的“重要性有时超过语义”。对汉语的研究来说,突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汉语的各级结构单位,直至语句的结构,都与这种音义互动密切相关;离开这种互动的研究,要揭示汉语语法结构的特点,那是很困难的。文国同志根据这一考察,并结

合语法研究的发展,提出语法史发展的三个阶段,认为第一阶段以形态为主要手段(如拉丁语),第二阶段以词序和虚词为主要手段(如英语),第三阶段则是以节奏和停顿为主要手段(如汉语)。这第三阶段的假设虽然有点大胆,而且论述也没有全面展开,但应该充分肯定的是,它突出地强调了汉语语法结构的一个重要的、长期为人们所忽视的方面。音义互动规律的研究应该是汉语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文国同志现在已清理出一个初步的思路,值得人们去作进一步的推敲、完善和补正。我们以往对语言结构的分析主要着眼于分布,考察结构单位的出现位置,探求主谓、述宾之类的结构,不考虑、至少是很少考虑音节和节奏在汉语结构中的作用,因而也就忽视了,或者说,甚至是放弃了汉语语法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的音节和节奏的研究。这实在是汉语研究的一项战略性失误。

以上是我读后印象比较深刻的三方面内容,也可能是文国同志采用新思路研究汉语、研究语言理论而带给人们的一些富有转向性的启示。以字为本位,那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科学无国界,凡是有用的东西都应该学;要发展中国语言学,自然需要吸收西方语言学中于我有用的理论和方法,实现中西语言学的有效结合。这是前进的必由之路。问题是,结合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立脚点。《马氏文通》之后的汉语研究基本上是以印欧语的理论为立脚点,把汉语结合到印欧语的理论框架中去研究,一般名之为“联系实际”。“联系”得好的,自然也不乏一些新的发现;而“联系”得不好的,往往只是用汉语的事实给印欧语的理论作注释。以印欧语理论为立脚点的结合恐怕难以解决汉语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其中最突出的自然要首推汉语词类的划分以及它们和句法结构成分的关系问题,百年来虽然经过几次周期性的大论战,至今也没有找到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实践呼吁结合立脚点的转移。文国同志对《马氏文通》之后汉语研究的批评和继此而进行的字本位研究,核心就是为了实现立脚点的转移,这就是:立足汉语的研究,对比印欧语的结构差异,紧紧抓住汉语的特点,从中提炼和升华出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字是汉语特点的凝聚点,牵一发动全身,抓住

了字,也就找到了结合落脚点的转移的突破口。文国同志的这本《字本位与汉语研究》从这一突破口深入,扩大视野,根据汉语特点的研究提炼出一系列相关的理论和方法,为实现这种落脚点的转移进行了一次发人深省的研究。

结合的不同落脚点必然会涉及中国语言学与国际接轨途径的选择。现在有一种强烈的呼吁,认为汉语的研究水平太低,应该努力学习西方语言学,与国际接轨。这一呼吁不错,问题是如何接轨,是“急起直追”,还是“迎头赶上”?《马氏文通》以来的汉语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基本上就是以西方语言学为楷模“急起直追”,人家有什么,我们就学什么;人家用什么概念,我们也跟着用什么概念,“……所有理论都是外来的。外国的理论在哪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吕叔湘为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稿》写的序言,语文出版社1986年),但“追”的结果只能是“跟着转”,还没有等我们完全弄懂人家说的是什么,人家的理论已经发生了变化,于是又得急起直追,继续“跟着转”。这样的循环往复,我们是永远也实现不了与国际接轨的目的的。怎么办?只能变“急起直追”为“迎头赶上”。什么是“头”?就是语言的特点。印欧语的理论是根据印欧语的特点总结出来的,我们要“迎头赶上”就得根据汉语的特点,吸取西方语言理论的立论精神和分析问题的思维方法,从材料的分析中提炼出相应的理论。文国同志的《字本位与汉语研究》就是采用这种办法去实现与国际接轨的目标,其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与现在流行的理论有很大的差别,但实质上最接近接轨的精神,相互之间是形异神似。通过这样的途径进行开创性的语言理论研究,既需要自信,更需要勇气,不怕人们讥笑“违背常识”,不怕得罪权威和与流行理论的碰撞。在印欧语的理论和方法面前,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种自信和勇气。这本《字本位与汉语研究》表现出文国同志的自信和勇气,值得推崇。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对这样的理论体系可能还不习惯,但只要能把握住“迎头赶上”的精神,我想人们是会逐渐习惯并发扬这种接轨的精神的。

新思路的理论著作,瑕疵是难免的,《字本位与汉语研究》自然还存

在着一些缺点和弱点。比方说,各章的质量不大平衡,后几章没有充分展开;把汉字看成为汉人的“第二语言”,其理论基础也还需要深入推敲;章句学的研究似可根据现在语篇的研究成果加以充实,等等。瑕不掩瑜,我相信这本《字本位与汉语研究》,不管人们是赞成还是反对,都会给中国语言学带来积极的影响。

2002年6月20日

绪 论 篇

汉语研究期待变革

第一章 汉语研究的世纪回眸

1.0.

历史已经进入了21世纪。进入新的世纪,人们免不了要对过去的百年作一番历史的回顾与总结,从经验和教训中探索今后前进的道路和方向。汉语研究也不例外。

学术研究从来不是孤立的,它受着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制约,更受着哲学和社会思潮的左右。研究20世纪的语言研究史,包括汉语的研究史,也离不开世界发展这个大背景。只有把学术研究放到整个社会进步的大环境中去,才能看出它真正的价值和趋势。

1.1. 20世纪汉语研究的成就

20世纪的汉语研究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要完整全面地对之进行总结,不是一两个人的事,甚至也不是一两本书可以解决的。本书并不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只是想以此为引子,探索一下我们面临的任务,因此只拟作一些粗线条的概括。我们认为,20世纪的汉语研究,至少有如下这些方面将永远载入史册。

1. 以《马氏文通》的出版为标志,汉语研究进入了“现代”期。
2. 汉语研究进入了世界语言研究的轨道,成为人类语言研究的一部分。
3. 涌现出了一批世界级的语言、特别是汉语研究大师,如马建忠、赵元任、王力、吕叔湘,他们都达到了他们所处时代的高峰,而为后人所难以企及。
4. 各门分支学科从无到有,日趋成熟。

5. 在语言的描写等方面出现了一批历史性的成果,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特别是在古籍整理、方言研究、实验语音学,以及工具书编纂方面。

6. 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这些方面都是彼此相关的,其中《马氏文通》的出版尤其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其余的一些,可以说是《马氏文通》之后语言研究面貌更新所导致的自然结果。《马氏文通》只是一本语法书,以一本语法书而引起了石破天惊的后果,改写了整个汉语研究的历史,其意义在历史上大约只有许慎《说文解字》的发表可以与之比拟(形成对照的是,许书的划时代意义远得不到马书那样的历史评价)。这个问题是值得深思的。其根源即在于它提供的不仅是一本语法书,而是语言观和语言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彻底更新。

1.1.1. 以《马氏文通》的出版为标志,汉语研究进入了“现代”期

在中国历史上,马建忠第一个把汉语研究纳入了世界语言研究的共同轨道,使汉语研究成了世界语言研究的一部分、全人类语言研究的一部分。马建忠引进了到他那个时代为止(或者确切地说,到他于19世纪80年代末从欧洲回国、开始写他的著作时为止)世界上比较先进的语言理论,把它运用到汉语理论的建构上。就在他回国后不久,1891年,英国语言学家亨利·斯威特(Henry Sweet)的《新英语语法》第一卷出版,标志着国际上语法研究乃至语言研究的又一场变革,而马建忠已经来不及看到,更不用说在他的书里有所反映。有的时候我们难以抑制地想象,要是马建忠来得及看到斯威特的书,能用新的目光来构架他的《马氏文通》,可能这本书完全是另外一种格局,而汉语语法研究的历史可能也会是另外一种面貌了。可是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因此我们只能怀着深深的遗憾看着当时马建忠的十年落伍,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对汉语研究根深蒂固的、长达整整一个世纪的影响。

马建忠当时引进的语言观,质言之,就是普世语法观,这是从柏拉图(Plato)以来,经过17世纪波尔·罗瓦雅尔(Port Royal)语法,在西方

世界占统治地位的语言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各国皆有本国之葛郎玛,大旨相似,所异者音韵与字形耳”(马建忠 1898:15)。凭借这一理论,“依西文已有之规矩”,马建忠轻而易举地构建起了汉语葛郎玛的大厦,以一个与西方语言(尤其是拉丁语与英语)一一相对应的标目、相类似的术语、相一致的体系,开始了与世界语言研究的对话。这一意义确实是不可小估的。

马建忠“革命”(如果我们可以称之为“革命”的话)对汉语研究的最大影响,在于从根本上改变了汉语研究的格局,颠倒了音韵文字与语法的位置。中国传统两千多年的语言研究,核心就是音韵文字;语法的地位,不客气地说,连“附庸”都算不上。但到了普世语法观的马建忠头脑里,各国“大致相似”的只是“葛郎玛”,“音韵、文字”既然各国相异,便没有很强的普遍性意义。加上文字音韵易变而语法“历千古而无或少变”(马建忠 1898:后序),于是从马氏以后,传统的文字中心不得不退位,语法研究一变而为语言研究的绝对中心。虽然其后有语音、词汇、语法三分,或语法、修辞、逻辑三分,或语音、语义、语法三分,或各种《现代汉语》教材的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等的五分,但谁都知道,其中的中心是语法。搞“现代汉语”、搞“现代语言学”而不搞语法,那始终进不了语言研究的核心,只能在周遭打转;至于文字更入了另册,在大半个世纪里,它是革命的对象。人们通常把《马氏文通》的出版看作是汉语研究现代化的开始,但《马氏文通》研究的仍是文言,不是白话,因而这一“现代化”的本质,从上面所述便可知道,其实是以语法中心取代了文字中心。由于中心的变更,带来了语言研究全局的变化,各项具体研究都要重新定位,寻找自己在新的语言研究格局中的地位,在新的学术“范型”里谋求生存与发展。

马建忠的书被人们“忆了万万千,恨了万万千”(陈望道语),是20世纪汉语学界提得最多的名字。对这本书的功过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我们在后面还会有机会讨论,但马建忠的创新之功是谁也无法抹杀的。

1.1.2. 汉语研究进入了世界语言研究的轨道

中西语言文字之交并不始于马建忠,早在明代就有过法国传教士金尼阁(Nicholas Trigault)的《西儒耳目资》这样的汉语研究著作,但他是以“西”就“中”,又没有带来什么先进理论,因而影响不大。马建忠以“中”就“西”,并以语法为突破口,把汉语研究带上了世界语言研究的轨道。此后,汉语研究的“现代化”就是在不断与西方“接轨”、以西方模式来进行改造的过程中运行着。

继语法之后,汉语研究的第二件世纪性成就是对旧音韵学的改造,建立了“现代”意义的汉语音韵学。这一成就的标志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的出版,其核心就是用西方语音学的元音开口度理论去解释中国传统的等韵学说,用“国际语音总表”的模式去解释为表现《切韵》系韵书而作的宋元等韵图,并借用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和理论实现了对汉语中古音乃至后来对上古音的构拟,以其体系的严密与完整为汉语研究树立了又一个样板。

语法学与音韵学的成功使汉语研究者尝到了体系的甜头。本来,中国古代不乏体系完整严密、博大精深的著作,例如《说文解字》。至于南北朝时梁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体大思精、超绝今古的文章学巨著。但毋庸讳言,中国人最拿手的做学问方法是点评式的评注,兴之所至,点到为止。这种方法的好处是不受形式束缚,便于发挥,往往观察精细而剖析深刻,但缺点是没有一个事先设好的框架,更不一定有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可以经得起逻辑的推导或编成金针度人的教材。于是从现代看惯西方动辄几十万言、充斥名词术语的皇皇巨著的人看来,就觉得自惭形秽。因而在学术研究上学习西方之长,建立一个学科体系就成了20世纪学术研究一个显著的特色。五四新文化运动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注重建立各种体系,就是“赛先生”的功绩。语言研究上也不例外。各种在20世纪之前零散不成气候的研究到了20世纪都逐渐冶铸成了各种“学”。就是连中国传统最看重的音韵文字研究,以前也只有专书没有专学,只有《说文》、《尔雅》、《广韵》、《方

言》以及各种《笺疏》、《疏证》、《义疏》、《校注》之类，而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都是到 20 世纪才成为有理论、有体系的“学”的，遑论原先就不甚受重视的“方言学”、“修辞学”、“理论语言学”、“语音学”、“语法学”以及“词汇学”、“语义学”了。与此同时，是各种“概论”、“学史”的泛滥，堪称 20 世纪汉语研究的一大景观。其中尤以研究历史最短的语法为最甚。

至于五四前后“德先生”对语言研究带来的影响，也绝对不可小看。在世纪初的学人们看来，要实现民主，首要之务是“开启民智”，开启民智最重要的手段是教育，而教育的基础是语言文字。为了普及教育，就必须对中国的语言文字进行改造。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只是对语言学习方法的改造，与之并行而手段更为激进的是清末开始的拼音切字运动，和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20 世纪中国的社会改革，居然是从语言革命开始的！20 世纪下半叶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语言学是领先科学”，在这里又可找到一个佐证。“德先生”对汉语研究带来的积极影响，是使人眼睛向下，注意民众的需要；而其负面，则使汉语研究，特别是其中的汉字改革问题，带上了过强的政治色彩。例如拼音切字运动进入 20 世纪以后，由于政府部门的重视，就演变成了一浪高过一浪、波澜壮阔的汉语拼音化运动，成了政府行为。一度曾提出的最高目标甚至竟是取消汉字，“走各国共同的拼音化道路”。把近百年来中国国势积弱、备受列强欺凌的根源算到了汉字头上。直到临近世纪末，这认识才得以纠正，但还带有不少后遗症。

1.1.3. 涌现出了一批世界级的语言研究大师

一门学科在草创之初，是最需要人才、也最能出人才的时期。汉语研究在 20 世纪突然进入“现代期”，旧的需要改造，新的尚未建立，一下子出现了许多领域的“真空”，这是一个呼唤大师、也造就大师的时代。这一百年来在汉语研究上也确实涌现出了一批这样的大师，其成就既辉煌于当时，也成为现代人的骄傲和榜样。其中最值得我们自豪的几位是马建忠、赵元任、王力和吕叔湘。